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3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3 2009
(第8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8)

顺应论:文学翻译的一个新视角

李占喜

(华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文学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在目的语认知语境中进行语言选择来阐释源发语文化的过程,这种选择发生在目的语语言任何一个层面上,它包括语言形式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之所以能够对目的语语言作出恰当的选择,是因为目的语与源发语同样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的特点。翻译中的语境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使用目的语语言阐释源语文化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语境会随着翻译过程的发展而变化。在顺应的过程中,译者必须使自己的翻译行为及思维运作顺应于源发语与目的语双方的认知环境,只有这样,他的译文选择才能确保不同文化之间交际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关键词:文学翻译;目的语言选择;变异性;商讨性;顺应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9)03-0090-08

一、引言

1985年,在第一届国际语用学研讨会上,Verschueren提出了"语用综观论"(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在随后出版的《语用综观论:1985国际语用学会精选论文集》,他又阐明了他的观点:"综观论是以语言顺应论作为核心进行探讨语言的使用问题的。"[1] 1987年国际语用学会成立时,Verschueren在发布的工作纲领中首次提出了"顺应理论"(Adaptation theory or 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2]。后来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对该理论进一步修改与补充,直到1999年他的新著《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3]出版,这一理论体系才得以系统化,并日臻完善。

以Verschueren的顺应论视角研究翻译,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尚未看到。国内,戈玲玲[4]较早地从Verschueren的顺应论视角,探讨了语境关系是如何制约译者的词义选择;她对翻译标准作出解释并论述了顺应论对翻译的启示[5],其对语用翻译标准的讨论落脚在"信、达、雅"、"信、达、切"上。宋志平从顺应理论角度审视了翻译现象及其本质,认为翻译活动是一种不断选择的过程,从译什么到怎么译,无不贯穿着社会、文化、认知等因素的互动选择机制[6]。笔者认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的特征是交际者语言选择呈现动态性的语用机理;这三个特征贯穿于译者译文选择过程的始终。倘若宋志平先生再抓住这三个核心概念进一步深入下去,相信他的研究更系统、更完善[7]。

二、理论回顾

顺应理论认为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的特

收稿日期:2009-04-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YY0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07JC740004]

作者简介:李占喜(1967—),男,河南开封人,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语用学.

征[3]58-63。语言的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作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指的是语言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

根据顺应论,我们必须从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等四个方面描述和解释语言的使用。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包括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和语言语境,后者也称为语言信息通道,即信道(linguistic channel),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语言手段。语境不是静态的,而是由不断被激活的语境因素和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动态生成的。语言结构顺应指语言结构和结构构成原则的选择,包括四个方面的选择:语言、语码和语体的选择;话语构建成分的选择;话语和语段的选择;以及话语构建原则的选择。语言选择过程的动态顺应可以从时间顺应、不同语境对语言选择的制约和语言线性结构的灵活变化等三个方面得到体现。

顺应过程涉及的认知心理因素,即意识程度。不是所有的语言选择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和认知因素的结合而形成的社会心理(mind in society),是语言使用者作出顺应和生成意义的依据。在言语交际中,人们不仅有语境意识,而且还通过社会心理对意识程度的不同反映,选择恰当的语言,作出恰当的顺应。交际者在选择语言、作出顺应时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反应,是一种元语用意识(metapragmatic awareness)。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如果元语用意识程度较高,顺应过程就是一种对话语作出调整和商议的自我监控过程。

三、文学翻译的顺应论

通过以上的理论回顾,我们得到一些启发,可以参照顺应论的理论框架提出文学翻译的顺应论,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翻译过程进行尝试性的阐释。我们认为:翻译可以视为译者在目的语认知语境中进行语言选择阐释源发语文化的过程。译者之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对目的语文本作出恰当的选择,是因为目的语与源发语同样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的特点。

在翻译过程中,在理解了原文的意义之后,译者会有意识地在目的语认知语境的不同层面作出语言选择,来传达原文作者试图表达的意义。译者的选择会受到目的语言外的因素及其语言内因素的制约。这些选择会出现在目的语语言的各个层面,如语音、词汇、句子、超语句等。译者在这些方面的选择通常是同时进行的。译者不仅仅选择语言形式,还要选择具体的翻译策略。这一选择是在对原文话语的理解和使用目的语言对其的产出过程实现的,并会呈现出译者语用意识程度。翻译过程一开始,不论他的选择结果是否能成功地传达原文意义,他都必须在目的语认知语境中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范围内作出选择。

由于翻译涉及到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交际,所以要准确地理解译者的语言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过程,我们就需要对 Verschueren 三个核心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以适合对翻译的相关研究。

变异性:界定译者对原文意义、目的语语言选择可能范围的语言特征。

协商性:对原文意义和相应的目的语语言的选择是根据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原则和策略来进行的语言特征。

顺应性:使译者得以从范围不定的语境中对原文意义进行可协商性选择,以及在目的语语言的一系列范围不定的可能性中,进行可协商的语言选择,从而满足交际需要的语言特征。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具有很强的跨文化意识,担负起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作用。译者必须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翻译过程中的顺应也就是,在使用目的语语言阐释源发语文化的过程中,译者使自己翻译活动及思维运作顺应于源发语和目的语双方的认知环境。

(一)语言结构的顺应

在运用目的语语言对源语文化进行阐释的过程中,译者要在语言形式方面作出顺应性的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自然要在源发语与目的语双方的认知环境中作出顺应性的选择。要在语言结构层面顺应于语码和风格;顺应来自于话语构建的全部要素(范围从语音结构、词素和词、小句和句子到命题结构及各种超语句单位);顺应范围涉及到话语和话语群集的全部类型;顺应的作出要根据句子性和超句性话语构筑,以及话语群集等层面上的话语构建原则来进行。在不同的结构层面上,根据不同的原则进行的选择活动之间总是相互依赖、相互顺应的。

1. 语音层面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在上下文语境中,译者在传达字面意思的同时,如果能够兼顾到源发语语言的音韵美感的成功传递,这样会使译文更好地传达出原文作者的意义。

例3: Home is home, be it ever so homely. [8]255

译文1:不论家多么简朴,家还是家。

译文2: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译文3:走南闯北还是自己的家好。

译文4:家虽不佳仍是家 (笔者译)

笔者在教英语专业语法课时,遇到了这个句子,让学生试着翻译一下。译文1—3是绝大多数学生的选择。这是他们在中国文化的认知语境与英美文化的认知语境中,在语言层面的顺应性的动态选择中得到的译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都传达了原文的字面含意。不过,译文2加进了汉语的一些文化意象:"金窝银窝;狗窝"等。译文3从语言风格上来看,好像是正式文体与通俗语言的混合使用。有点遗憾的是,他们的译语选择都没有注意到该句话在语音层面上的特点:三个词有相同的音韵。笔者在翻译该句话的过程中,首先考虑到的是,该句话具有谚语式的语言风格,其次,考虑怎样传达 home; home; homely 三个词的音韵。

从语言风格方面来讲,考虑到传达音韵特点,译者要顺应于汉语音韵的特点,尽可能地传递原文在音韵上的美感。笔者想起了看过的一则译文评析。那篇文章讲的是,在美国竞选州长的过程中,一位参选人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拉选票,有一位新闻记者,在报纸中对其可耻行为的评论中,用了这样一句话,"What a candid candidate!"。有一位译者给出了这样的译文:"脸皮还不算太厚的候选人!" 该译文充分顾及到话语中的音韵效果,很好地传达了记者辛辣讽刺的语言风格。受这个例子的启发,笔者在翻译例1时,顺应于中国文化的认知语境,给出"家虽不佳仍是家"的译文。

2. 词汇层面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必须在解读原文文本、或者说,在与原文作者进行跨文化交际对话时动态生成的语境中,在词汇层面作出适当的语言选择。就把握词义而言,不仅要把握词的"词汇意义",而且要把握词语的语法意义和语境意义,即从具体的语境出发,细心地体会词汇的意义。

例4: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

译文1:I t seems likely that Chinese myths remained separate fragments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the early dwellers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were not an imaginative people...

译文2:The extant Chinese myths are only fragmentary and the reason is two - fold. To begin with, the ancient Chinese inhabiting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were not favored by good natural conditions ... [9]76 - 81

在翻译此段的过程中,一方面,译者必须在汉语认知语境中,对“惠”字的变异性的含意中作出协商性的选择,这一选择是根据高度灵活性的原则和策略进行的。因为“惠”是一个多义词, 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变异性的释义:

(1)“小惠未遍,民弗从也”　(《左传·庄公十年》)　意为,“恩赐”;
(2)“惠而好我,携手同行”　(《诗经·邶风·北风》)　意为,“恩爱”
(3)“昊天不惠,将此大戾”　(《诗经·小雅·节南山》)　意为,“厚待”
(4)“其养民也惠”　(《论语·公冶长》)　意为,“宽厚”
(5)“德胜不祥, 义厌不惠”　(《汉书·艺文志》)　意为,“和顺”
(6)“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　(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　意为,“聪明”

从上面六个例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不同的语境中,“惠”字具有不同的含义。译者要在对原文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动态地生成正确理解“颇乏天惠”的语境,该句意为“缺乏优越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译者在用目的语语言阐释该句话时,也必须对“惠”字的英文对应词作出灵活的、协商性的、顺应性选择。因为“惠”字 在英美文化的认知环境中的对应词也同样具有变异性的待选词项,“favor, kindness, benefit; kind, gracious, etc.”等[10]433。

从原文上下文来看,“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应该译成“the early dwellers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were not favored by good natural conditions”或者,“the ancient Chinese inhabited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where natural conditions are unfavorable”。所以说,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需在与原文作者进行跨文化交际对话时动态生成的语境中,并结合汉语认知环境中的历史渊源才能作出适当的语言选择。在传达原文作者的意义方面,译文 2 是恰当的语言选择,做到了较好的顺应。

从语体风格上讲, 原文是古汉语, 语言风格古朴凝重, 即使对于当今的中国读者来讲, 也较为难懂。两种译文都用了现代英语来阐释原文文本。虽然译者在目的语认知语境中没有很好地作出动态顺应, 但是我们读者是可以接受的。试想:假如用古英语从语体风格上作出源发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的动态顺应,只怕广大读者连读都读不懂, 那又何谈用目的语文本与目的语读者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呢?

3. 句子层面

句子是表达思想的基本单位,在文本的构思谋篇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能否处理好句子在字面含意和语体风格方面的译文表达,是整个翻译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翻译时,译者对句子意思的理解,必须在与原文作者对话的动态语境中,细心体会,认真解读,以便从字面含意和和语体风格方面,使翻译活动动态顺应于目的语文化的认知语境。

例 5: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Sir Francis Bacon:*Of Studies*)[11]96-99

译文 1: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采,足以长才。　(王佐良译)
译文 2:读书能给人乐趣、文雅和能力。　(廖运范译)
译文 3:读书可以怡情养性,可以撷拾文采　(王　楫译)
译文 4:读书予人乐趣、赋人文才、长人才干。　(周　仪译)

《谈读书》是 Sir Francis Bacon 散文语体风格的缩影。他的文笔简约、自信,格言警句迭出。译者要翻译好这篇文章,不但要在阐释字面含意上下工夫,而且更要在把握原文主题思想的同时,注意兼顾对原文文体风格的传达。从文学翻译的顺应论的视角来看,译者既要在字面含意上作好源发语认知语境和目的语认知语境之间的动态顺应;另一方面,又要在语体风格方面找出一种最佳的顺应。

从四位译者的译文来看,王佐良的译文作出的动态顺应最佳,他把首句语言的含意阐释得准

确无误,同时把该句的语体风格,诸如,简约、口吻、修辞效果传达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使汉语读者读后掩卷品味,回味无穷。译文:2—4 有一个共同点:在原文文本的字面含义上,都作出了与目的语认知语境较好的动态顺应。但是,在语体风格的传达上,与王译相比则较为逊色。廖译虽简约,但他的译文的排比修辞效果欠佳,没有在汉语中寻求到最佳顺应。王楫的译文似乎不能顺应原文的简约,而且排比稍欠工整,读起来略嫌拗口。周译选词得当,排比整齐,但两个顿号似乎打破了排比节奏上的美感。

4. 超语句层面

衔接和连贯是超语句层面上组句成篇过程中相辅相成,互为依赖,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衔接和连贯不是孤立的文本现象,而是实际交际活动中确立的与交际目的、场合、对象等密切相关的信息传达手段。衔接和连贯是信息发出者进行一系列选择和决策的结果,同时也是信息接受者在解码过程中必须加以识别和依赖的语篇特征。"[12]189

顺应论认为,意义的生成是语言使用的全部内容,制约话语(及话语群集)产出和解释的主要的话语构筑原则,应该和内容的组织有关,这种组织在形式上主要体现在衔接和连贯话语构筑原则之中[3]135。翻译时,在使用目的语言阐释源发语文化的过程中,译者必须使自己的思维顺应于源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思维模式,以便在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效的相互转换机制。

例 6:白杨树是不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为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

(茅盾,《白杨礼赞》)[12]175

译文:White poplars are no ordinary trees. But these common trees in Northwest China are as much ignored as our peasants in the North. However, like our peasants in the North, ...

(张培基译)

从张先生的译文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在翻译该段的过程中,他很好地注意了英语和汉语在逻辑表现形式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英语句群的逻辑层次多呈显形,汉语句群的逻辑层次则多呈隐性。显性与隐性虽然是一对矛盾,但译者处理得恰到好处:原文没有使用一个连接话语的构建成分,即,汉语句群中没有任何逻辑标记,各词组、小句、句间的逻辑关系全凭读者自己领会。

在译文中译者用两个话语的构建成分, But, However,把原文的逻辑层次很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这说明,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在吃透原文作者意图的前提下,不仅在原文的字面含意方面,在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中作出了很好的顺应,而且在结构层次方面,根据英语逻辑表达的隐性特点作出了灵活的变异性顺应,同时使用地道的现代英语成功地传达了原文文本的语体风格。翻译时,译者在目的语文化中作出不断的恰当的语言选择是在理解与阐释原文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与原文作者和译语读者的跨文化交际对话的动态语境中进行的。

译者的语言选择除了要考虑如何实现原文话语群集的衔接和连贯问题,有时还要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叙述思路。所谓叙述思路,即叙述者所遵循的思维路径。一般情况下思维路径是连贯不变的,但有时也会发生思路上的转换,需要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出灵活性的变异性的处理。

例 7:……(王道士)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了缝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余秋雨:《道士塔》)[12]186-187

译文:... He (Taoist Wang) just felt it strange, thinking to himself, "Why did the wall break while I was here? It might be a reward for me from heaven. Next time I go to the county town, I'll show some of these to the county magistrate and tell him about this strange event."

在上述句群中,作者在叙述一个世纪前莫高窟的王道士偶然发现藏于石壁中的珍贵文物的情况。前两句依循的是第三人称叙述者的思路:“他”如何,如何。但从划线部分,思路转到王道士的思维轨迹:“我”如何,如何。这种转换不会破坏语篇的连贯性,因为从汉语读者的认知环境看来,这是十分自然的。读者会构想出有关情节,跟上作者思路的转换,形成一种心理脚本(mental scenario)。

对于译者来讲,使自己的思维顺应于原文作者思维轨迹的转变是不会有太大困难的。但是,译者在明晰英汉语篇叙述思路转换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思维作出灵活的调整,以便顺应于译语认知环境中的语篇叙述思维模式,从而使译文文本成功地传达原文作者独特的叙述思维模式,这一点却是比较困难的。

译者在注意到原文叙述思路出现变异的同时,对这种变异性作出了顺应于译语认知环境的灵活处理:译者对原文作了两处调整。一是增加了表明情境的词语 thinking to himself,二是将原文划线部分作了变异性处理,使用直接引语——其实这也是表明情境的手段。这也说明,译语文化中表达语篇的叙述思维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具有高度灵活的协商性、顺应性的特点。

对源语语篇的衔接手段和连贯结构的认识,以及使用译文语言实现语篇的连贯,是翻译操作中的两个重要环节。在翻译过程中,对它们的阐释过程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构思谋篇、变异思维方式相互顺应、相互碰撞、又灵活协商、求同存异的动态顺应过程。

(二)语境关系顺应的动态性

在翻译中,译者必须顺应目的语语言的社会、文化语境,也就是说,要顺应不同文化的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渊源、意识形态、经济方式、时代背景、地域环境、人文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等。这些因素会成为语用制约成分,对译者的语言选择产生影响,在某种情况下,还有可能是决定性的。

例 1:(4) Premises:Either the Anarchists or the Communists will win the final victory
The Communists won't
Conclusion:The Anarchists will win the final victory[13]17
前提: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共产主义者,将获得最后胜利,
无政府主义者不会获胜,
结论:共产主义者将获得最后胜利。(注:译者有改动)[14]

在这个例子中,读者不难看出, 王维贤的译文选择明显受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汉语认知语境中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国人民坚信共产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如果直译,可以忠实再现原文作者 Allwood 等所表达的意义,尽到了一个译者应尽的职责。但是 中国读者恐怕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忠实的译文与我们的意识形态相悖。我们推测,在译者的职责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之后,王的译文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就是说,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一语用因素在他的译文选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除了社会、文化语境之外,译者的译文选择还必须顺应于译文的语言语境。比如,篇际制约(intertextuality),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判断原文中的语境是否在目的语认知语境中有相同或相似的语境。如果有,译者就可以采用直接性翻译策略来实现篇际制约的连贯性[15]133, 否则,他需要采取间接性翻译的策略提供原文作者试图传达的互文语境[15]135,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下面例 2 中,在表达爱情忠贞方面,由于中国读者和西方读者有共同的认知图式,所以许渊冲、袁可嘉都才用了直接性的翻译策略成功地传达了原文的意义。

例2.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
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无名氏:《菩萨蛮》)
On the pillow we make a thousand vows, and say
Our love will last unless green mountains rot away,
On the water can float a lump of lead,
The Yellow River dries up to the very bed.
(Tr. Xu Yuanzhong 许渊冲)[16]
And I will lo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 the seas gone dry.
Till the seas gone dry, 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Robert Burns: *A Red Red Rose*)
我永远爱你,亲爱的,
一直到四海枯竭。
直到四海枯竭,亲爱的,
直到太阳把岩石消熔,
(Tr. Yuan Kejia 袁可嘉)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还要考虑到顺应的动态性。时间维度会影响到译者的语言选择。也就是说,译者的选择会因时代的推移作出不断的调整以适应于不同的读者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目的语读者的阅读视野会不断扩大,其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等方面都会不断提高。译者的语言选择和翻译策略由原来的一味考虑目的语读者转向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义,这也许是翻译界学者认同的异化翻译策略渐占上风的一个原因。

译者的语用意识程度是不能够精确度量的。事实上,在翻译研究中也没有必要去确定译者在目的语言选择过程中的意识程度。当译者意识到他采用直接性翻译策略不能够成功传达出原文的意义,他与作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的交际活动难以顺利进行下去时,他就会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期待,转而采取间接性翻译策略,以确保跨文化交际的成功实现。如果翻译过程有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审美观念等因素的介入,译者的语用意识程度会更高,因为,译者不得不在恪守忠实传达原文意义的职责和对其进行操纵性重构的矛盾冲突中作出抉择。

四、结语

本文在 Verschueren 的顺应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文学翻译的顺应论,以一个新的视角,从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语音层面、词语层面、句子层面和超语句层面)、顺应的动态性、以及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语用意识等相互联系的方面,对文学翻译过程进行了尝试性的阐释与探讨。从中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文学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在目的语认知语境中进行语言选择来阐释源发语文化的过程。这种不断进行的语言选择活动发生在任何一个可能层面上,包括语言形式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之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能够对目的语文本作出恰当的选择,是因为目的语与源发语同样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的特点。翻译中的语境,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使用目的语语言阐释源语文化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语境会随着翻译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在顺应的过程中,译者必须使自己的翻译活动及思维运作顺应于源发语和目的语双方的认知环

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具有很强的跨文化意识,担负起沟通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神圣责任。译者还必须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只有这样,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才能够顺利地进行。

参考文献:

[1] VERSCHUEREN, J. & B. P. Marcella. (eds).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985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Conferenc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7.

[2] VERSCHUEREN J. Pragmatics as a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 First Working Document for 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in preparation of a Handbook of Pragmatics[M]. Antwerp: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1987.

[3] VERSCHUER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1999.

[4] 戈玲玲. 语境关系顺应论对词义选择的制约[J]. 中国科技翻译, 2001, (1): 27 – 29.

[5] 戈玲玲. 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兼谈语用翻译标准[J]. 外语学刊, 2002, (3): 7 – 11.

[6] 宋志平. 翻译:选择与顺应 – 语用顺应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04, (2).

[7] 李占喜. 国内外语用翻译研究:回顾、述评与前瞻[J]. 上海翻译, 2008, (1): 20 – 25.

[8] 章振邦. 新编英语语法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5.

[9] 冯国华. 语境通观,随便适会——在语境中把握意义[J]. 中国翻译, 2002 , (1): 76 – 81.

[10] 危东亚. 汉英词典[K].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11] 王佐良. 翻译:思考与试笔[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12] 李运兴. 语篇翻译引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13] ALLWOOD J, ANDERSSON L. G. & O. Dahl. 1977. Logic in Linguistics[M]. Oxford: The Alden Press.

[14] 王维贤, 等. 语言学中的逻辑[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2.

[15] GUTT E. –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1, 2000.

[16] 许渊冲. 中国古诗词六百首 [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1994.

An Adaptation Theoretic Approach to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LI Zhan-x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We maintain that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makes continuous linguistic choices in the target environment to interpret the source culture; the choices, including both target linguistic form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merges at such linguistic levels as sound, word, clause or sentence, supersentence, etc; the reason why the translator is able to make appropriate choices to convey the original meaning may be that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are characterized by three key features: variability, negotiability, and adaptability. The context in translation is dynamically generated in the translator's choice-making to interpret the source culture and it changes with the progress of translating process. The translator has to adapt his behaviors and thinking both to the source and target cognitive environments. Only in this way is he able to should his responsibility for ensuring a successfu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target linguistic choices; variability; negotiability; adaptability